

鼓浪学术书系·古典文学新视野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王玫 著

洛神賦
卷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鼓浪学术书系·古典文学新视野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王 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王玫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7

ISBN 7-5325-4088-X

I. 建... II. 王... III. 建安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9.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0356号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王玫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宏达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

ISBN 7-5325-4088-X

K·723 定价: 2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曹 序

在我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来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提到这个时代，往往竭力推崇，视为文学的“盛世”之一。的确，在这个时期内，曾经涌现过许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辞赋和散文，有些名篇至今为人们所传诵。关于这个时代文学的繁荣及其原因，历来论者多有论述，并多精见。然而说到建安文学对后来作家的巨大影响，许多论者虽也经常涉及，但要对这种影响作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则尚罕见。在这方面，王玫教授在建安文学接受史研究可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开创作用。

王玫教授为了全面地把握这问题的各个方面，她化了许多精力，细心阅读了各种第一手史料，并且把研究的眼光涉及到文史以外的许多领域，包括书法、绘画和戏剧等等，甚至涉及域外的日、韩、越南诸国，其用力之勤，令人钦佩。尤其难得的是，她的论文采用了西方学者提倡的“接受美学”观点来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的，因此颇多创见。关于“接受美学”等西方新说，我显然是门外汉。不过，照一般情理来说，这种学说应该是很有道理的。例如：同一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身上可以引起完全不同的观感，这就和读者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西晋以来，许多人评论建安作家，可以有許多分歧，正如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所说：“及公幹、仲宣之论，家有曲直。”至于后代从两晋南北朝历隋唐五代宋

2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元明清直到今天,这么多人在谈论“建安文学”,往往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看来很难强使一致,然而正是在这种争论中推动了诗歌和各种文体的发展进步,而这许多论者,其实皆取法建安文学,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谁也没有能完全摆脱建安文学的影响,也不可能否定这个传统。这道理是很明显的。因此探讨建安文学的影响,十分必要。事实证明:王玫教授此书是一本力作,它的出版对当前的建安文学研究显然可以起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认识王玫教授是在2000年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在此之前,我曾经听我的学生吴先宁博士谈起她的治学勤奋谨严和富于才气。在天津那次会上,才知道她专攻魏晋南北朝文学,并且正在福建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吾友陈庆元兄。2002年夏天毕业时,蒙陈兄和王玫教授不弃,命我充当答辩委员。那次在福州畅谈,极为愉快。同年秋天,在镇江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文选》学术会上,又一次见面畅谈。我觉得王玫教授治学十分刻苦,业务基础扎实,分析问题敏锐深入,确是当前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的一位后起之秀。

最近,王玫教授又对她的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准备出版,命我为序。我自惟对“建安文学”虽颇有兴趣,但迄今未下过多少功夫,所知甚少。尤其是对西方的新学说一无所知,恐难当此重任。但作为庆元兄多年的老友,又和王玫教授很熟,推辞的话,未免不近人情,所以勉力为之,难免有不当之处,还请王玫教授和广大读者加以指正!

2004年8月2日 曹道衡序于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时年七十有六。

陈 序

钟嵘《诗品》论汉魏至梁初诗,从东汉末年开,一段时期的诗歌或文学,大多借用年号来表述,例如建安、正始、太康、义熙、元嘉、大明、泰始、永明等。历史上的年号,是很明确的,例如“建安”,它是汉献帝的年号,从公元 196 年起,至 220 年止;又如“永明”,为齐武帝的年号,起于公元 483 年,止于 493 年。但是,文学史上借用年号来表示某个时期的文学,起迄的时间可能就不完全与年号一致,通常讲的建安文学,大约始于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董卓之乱,止于曹植过世的魏明帝太和六年(232),由东汉中平,至建安、延康,跨入曹魏的黄初至太和。永明文学,大体是指南齐武帝初年,中经南齐诸帝,至梁天监初沈约卒(公元 512)一个时期的文学。钟嵘借用年号来表述某个时期的诗歌或文学的做法,为后人所承袭,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著作和各种论著,在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和文学时也基本上采用这一表述。

钟嵘所论述的各个时期的诗歌和文学^①,建安诗歌或建安文学早已为六朝人重视。与钟嵘同时代的刘勰,其《文心雕龙》一书在不少篇章中都给予建安文学很高的评价,对许多重要的作品给予中肯的品评。晚于钟嵘的梁昭明太子,在其编纂的《文选》中大量选了建安作家的作品。唐代之后,对建安文学的推崇更是不胜枚举。钟嵘《〈诗品〉序》中还提出一个“建安风力”的概念,“建安风力”即“建安风骨”,后世的作家非

2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常看重建安诗歌的风力或风骨。唐陈子昂曰：“文章道蔽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与东方左虬修竹篇序》）李白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五十九首》其一）又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陈子昂或李白是不是有贬低其他时代文学之意，不在这篇序讨论的范围，但是他们对建安文学特别推崇，则是肯定的。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十多年来，各种各样的文学史和各种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本，对建安诗歌、建安文学特别钟爱，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大多数中文系的本科生来说，他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家，毕业之后还有较深印象的除了陶渊明之外，就数“三曹”、“七子”和蔡琰等建安时期的作家了。建安作家、作品或建安文学对文学史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当然不是一两个批评家的功劳，而是建安作家、作品和整个建安文学本身一千多年来不断展现出它的魅力，并为历代的读者、批评家、作家、出版商所接受的结果。

建安文学的研究，近五十多年来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所出版的专著、发表的论文、文献整理和注释的数量，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可以和陶渊明、《文心雕龙》比肩。有关建安文学的论著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不少论著也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深入地、富有创造性地研究建安文学，非常值得治魏晋南北朝文学者思考。王玫于1999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选《建安文学接受史》为博士论文的题目。王玫入学时已经出版过《六朝山水诗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人物志（评注）》（红旗出版社，1997年），发表了有关六朝文学的许多论文，建安文学的研究有相当的基础。

当然，选择《建安文学接受史》这样一个论题来作博士论

文,不是仅仅有良好的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基础就可以了,因为文学接受史的研究,或者是接受美学的研究,不可回避西方文论和西方比较新鲜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没有一定的西方文论基础要进行一项课题的研究是不可能的。而西方文论比较集中地介绍到中国来,中国的学者比较多地运用西方新的研究方法,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王玫对西方文论和新的研究方法比较关注,入学之前,已着手翻译美国学者卡米拉·帕格利亚所著的七十多万字的《性面具》(2003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西方文论大量的译介,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这股译介的潮流来得比较迅猛,不少的学者没有太多的思想准备,还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逐赶潮流,刻意标榜,生吞活剥,以至食而不化,其末流的论著甚至大量出现名词轰炸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西方文论和新方法论译介的声誉。1992年,我的《中古文学论稿》出版,《古典文学知识》记者问及治学态度时,我说道:“既不盲目趋时、赶时髦,又不抱残守缺、拒绝接受新东西。”(《古典文学知识》1993年第1期)这一治学态度,至今我始终没有改变。因此,对王玫的这一选题,我始终抱有很高的期望。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对西方文论和新方法论译介,学术界已经采取比较冷静的态度,学者对西方文论和新方法论的吸收和运用也渐趋成熟,我们看王玫的论文,绝没有新名词的堆砌,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大抵游刃有余,即使没有读过什么西方文论和不太了解新方法论的读者,读她的论文也绝没有太多的障碍。就这一点来说,论文应当是成功的,这也是建安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十来人,由于他们各自的文学成

4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就不同,也由于后世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接受者的修养、好尚的差异,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甚至不同的受众对它的接受也不尽一致。对这一问题的阐述,通常的方法是举证说明。王玫在《建安文学接受史》中运用了比较多的图表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应该说效果也是好的。图表或定量分析的方法是自然科学论文比较常见的方法,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论著比较少用或不用。定量分析是一项非常琐碎的工作,首先要认定统计的对象,其次要精心计算、核实,最后是分析。统计数字还不是结论,作者还必须对一些数字做进一步的分析,并从中提炼出分析的结论。王玫的这一尝试是可喜的,这不单单是由于统计做得很仔细、很认真的原因,还因为统计分析的结论也是可靠的。

《建安文学接受史》的写作经历了大约两三年的时间,在写作过程中,其中一些章节已先期发表在《文学评论》和《厦门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刊物上。整部文稿已经完成近三年了,王玫获得博士学位也已经快三年了,我一直催促她的论文尽早出版。年前,经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先生的审查推荐,已经同意接受她的书稿,我为之高兴。

1982年初,王玫在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执教。这一年我研究生毕业,从南京来福建师范大学工作。福建省的高校本来就不多,但彼此来往很少,交流也很少。1989年,福建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在漳州成立,我和厦门大学的蔡景康教授当选为副会长,趁我便回了一趟厦门,经景康教授介绍,认识了王玫。当时王玫的住房似乎很小,印象较深的是藤椅藤桌,桌上摊开着一部《晋书》,景康教授说,王玫从事的也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1994年,我协助山东大

学张可礼教授指导博士生林怡,1997年林怡的博士论文《庾信研究》顺利通过答辩。1999年,我在福建师范大学开始招收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这一年,我录取了王玫和汤江浩两人。王玫入学时已经当了七年的副教授,招收多届的硕士生(她指导的研究生中有一名叫庄筱玲的女生,在校期间在《古典文学知识》发表了一篇古代文学与西方黄昏意象比较的文章,甚有灵气,甚得王玫的文风)。就王玫当时的学术水平而言,博士是可考可不考的,当然,考取博士生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作一篇水平较高的论文也并非坏事。王玫在厦门大学读本科生时,有好事者称之为“才女”。她间或写些诗歌散文什么的,还参加过“笔会”。后来,我才知道,她还会弹古琴——也许“才女”未必是戏称。她现在住在厦门大学一个叫“凌峰”的小区,背依五老峰,面对无边无际的汪洋,松风海涛、南普陀寺的晨钟暮鼓,生活于其间,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读书写作,怡怡然自得自乐。当然,我也期待她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

1982年,曹道衡先生从北京前往南京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事隔二十年,即2002年,曹先生南来参加王玫的博士论文答辩。1992年我的《中古文学论稿》问世,承曹先生赐序;事隔十二年,即2004年,当他得知王玫的《建安文学接受史论》将要出版,又早早地寄来序文。曹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研究六朝文学的著名专家,兼任中国《文选》学会会长等职,他指导的博士生刘跃进、傅刚、吴先宁早已成名。二十多年来,曹先生始终关心我的学术,而且惠及我的学生,除了王玫,我指导的硕士生林汝超、博士生林怡(协助张可礼教授指导)、汤江浩、叶枫宇都是经过曹先生答辩或撰写

6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论文评语后获得学位的。曹先生年事渐高,我近年较少进京,借此机会,遥祝先生身体健康。

陈庆元

乙酉春于福州烟山南麓华庐

附记:昨天,也就是2005年5月9日下午,刘跃进兄从北京打来电话,说曹道衡先生于当日上午11时病逝。2000年6月初,曹先生前来福州主持王玫答辩,我陪先生去平潭,先生有些疲惫;次日,我送先生上机场,先生似不经意地说,不知还有没有机会再来。我一向不太相信讖语讖诗一类的话,但是当时还是不觉一愣。曹先生病笃已经半年有余,去秋,我到北京参加国际地方文献研讨会,曾前往北京医院拜望,当我离开医院那一刻,鼻子不觉一酸,害怕一去将成永别。本文文末,曾遥祷曹先生早日康复,但是,一切已经徒劳,文星还是陨落,哀哉!从此,中国失去一位成绩卓著的文学史家,中国社科院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研究员,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在本文付排之际,附记数语,以期追念。陈庆元识于2005年5月10日午后。

① 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等,都尝试为诗歌史或文学史分期,但钟嵘的分期更为后人所接受。关于这问题,拟另撰文讨论。

导 论

在我国,“史”的观念发生得很早,但文学史观的确立则以文学观念自觉为前提,文学必须独立于政治、哲学,或经学、史学,也才有文学自身的历史。魏晋六朝是“文”的自觉时代,作为这时期文学理论著作的代表,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述了骚赋乐府古诗各文体的源流正变,俨然已是一部文学发展简史。刘勰不仅注意到文体自身的衍变,也看到自然物色对人心的感荡作用,以及历史现实因素,都影响到文学创作活动的进行,这种文学观念也为后代的文学史家所接受。迄至近代,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西学东渐,更是打开人们的视野,对文学的历史性问题的重新思考促使这时期涌现出不少文学史专著。这些著作以更加庞大的理论框架揭示中国几千年文学发展历程及其所凭依的现实基础,但是观念上依然是传统的社会历史决定论,以至特定的历史时期,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则演变为阶级斗争反映论,文学发展史成了阶级斗争史。近二十年随着思想逐步解放,“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愈来愈高,一些学者试图从新角度、用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重构文学史,并取得初步成绩。但观念的进一步解放及方法的恰当把握仍势在必行。

传统的文学史观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对待具体文本的

2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态度,强调对文本原义的还原,与此相应的方法便是考据索隐或“述而不作”;另一是阐述文学发展过程,注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文学的制约作用,试图藉此对文学发展规律获得客观认识。两者在本质上都是从作者作品的立场出发,企图客观把握文学事实,读者在此是被忽略不计的。事实上这种认识的客观性无法做到,认识本身就不可能是客观的,而历史文本中的“历史”是否就是历史的原貌?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只有为人所接受的历史,不存在在人的认识之外的历史。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因为文学的意义只能出现在现实主体与历史文本的对话和阐释之中,读者作为接受主体赋予文学发展以历史的连续性,读者不是被动地消极地接受文学作品,单纯强调社会现实对文学的制约作用,并不符合文学接受的真实状况,社会现实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影响应是间接的。在接受过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决定其对文本的接受态度,由读者个性气质、生活经历、思想修养等诸多因素制约,形成不同的阅读动机和接受心态。

引进西方接受美学或解释学理论,从读者或文本角度审视文学的历史发展,或许对解决历史上纷争不已、歧义百出的文学文本不无助益。比如阮籍、李商隐的诗题旨隐晦,真意难辨,后人对此多凭猜测,“一篇锦瑟解人难”,“可惜无人作郑笺”,均道出把握作者本意之困难。若本着对作者作品进行所谓的客观认识,或从社会历史现实方面对文本形式加以解释,显然是颇为棘手的事,何况这种接受方式实际上已带有主观色彩。把文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等理论观点往往导向还原文本“原意”的企图,由此出发就有为了维护经典原义,强调“述而不作”的

治学传统。但是无论对经典文本只作注、疏式转述,还是试图阐释文本原义,都不可能是原样再现,主体的认识必然已渗入其中。如果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待这些文学文本,有关难题或许能自行消解,而不能不承认各种各样的读者接受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锦瑟”无非给传统的思维方法出了一个难题。

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后代文学批评家理论家无不奉之为圭臬。这一说法的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作家创作必然受制于他个人先天和后天的条件,认识其作品必须对他的为人有所了解。但这种认识方式依然还是从作者作品的立场出发,而非从读者的视角来看待文学接受。由此发展到后来,也就有以人品论文品的标准,难免就有诸多困惑。比如一些看上去人品有亏的作家,偏偏写出上好的作品,这时究竟以人为主,还是以文为主来评价文本的价值?如果执其一,如何解释二者的关系?如果兼及二者,往往因人废言,难道是一种客观的态度吗?仅仅用作者思想性格矛盾显然不能对此作出圆满解答。对此,美国解释学学者赫施所说的文本的“含义”与“意义”之别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赫施在其《解释的有效性》中指出,“含义”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中,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赫施认为文本的含义是确定不变的,而意义乃处于变动不居的历史演变之中。文本含义和意义分别是解释和批评的各自对象,解释是为了揭示含义,批评是为了阐发意义。文学史应不同于文学批评史,批评家可以根据与文本有关的某个人、某个情境对文本“意义”进行考察,但是文学接受(或如赫施所言的“解释”)则在于把握文本的含义。

4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在读者接受过程,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不受读者“期待视野”所制约。读者接受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决定作品的价值。犹如一些歌功颂德道貌岸然之作,虽然借助种种政治手段或舆论鼓吹而流传,若不能为读者所接受,终究泯没不闻。同样,同一作者,他的作品必然也有不同的命运,就像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家喻户晓,而他的一些讽谕之作就未必为人所尽知。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是因为有接受它的读者,反之亦然。尽管从解释学角度来看,文本含义是确定的、可复制的,唯一能决定文本含义的只有创造该文本的作者。而解释具有广泛性,因为其对象本身是广泛的,解释离不开想象和猜测。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文本作者的原意是不存在的,它在历史长河中已演变成一系列他者,为此,一个解释者要达到对文本含义的确切理解是不可能的。不过,正如赫施所认为的那样,对文本的理解或接受并非完全不确定的、相对的,确切理解的不可能性不等于理解的不可能性,这使接受或理解有其一定的规律可寻,文学接受史写作因此是可能和可行的。

引进西方文学理论,打开理论视野,或许尚非难事,如何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的文学史撰写中,却不容易。首先既要改变以往社会反映论的文学史观念,也要适当吸收西方理论的合理方面。而要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文学接受史,也就是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与不同时代的读者的一种关系史,观念的解放是首要的。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决定性作用,未免有忽略文学创作及接受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系之嫌,但是接受美学并不否定社会现实的作用,在解释读者“期待视野”之构成时,实际上已包含社会因素等方面。不同于历史主义所认

为的那样,把历史发展看成一个从某点出发,一个个事件进展到某一点终结的过程,接受理论或许更倾向于历史并无一个突发的开端和确定的结尾,创作与接受、作者与读者之间也是一种循环相连的关系。并非仅是作家作品才受到社会现实环境的制约,读者接受也是如此。因此在文学史的具体撰写中,应当妥善解决现实背景与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的复杂联系,既避免社会反映论之缺失,也弥补接受理论的某些不足。其次,中国式接受美学的理论建构,可以根据历史存留的大量资料,着力探讨读者的接受心理、接受方式、接受态度,及共时轴、历时轴等一般性问题。我国古代经史子集及笔记杂录小说野史诗话词话文论中均保存相当丰富的接受美学资料。《庄子》中就有关于认识的相对性、差异性和主观性的表述^①。《易经》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②;后代也有“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③，“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之说^④。这些资料无异中国的接受美学。读者接受并非不可捉摸的、完全随意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比如同—接受主体由于生活阅历或者说“期待视野”的变化,引起对事物认知方式、态度的转变;舆论鼓吹及时尚趋向也影响到读者接受;接受心理分析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如舍近贵远、崇拜名人的心态,在今天的读者接受活动中依然可见。此外,个体或群体接受又有明显的阶层性特征等等,在研究读者接受史时都值得作进一步探讨。

读者文学接受史可以考察一部文学文本的读者接受状况,如《诗经》自其产生以来,各代读者的接受情况,而后人与汉儒的接受标准、接受方式就有很大不同,由此可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标准之差异,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

6 建安文学接受史论

过程。但是历史不是割裂的,第一代读者的阅读接受又未尝不对后代读者发生影响,在接受过程中有可能存在各种交叉状态,掌握其间的规律,或可清理出文学发展的脉络线索,认识民族心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此外,以一个时期文学接受为考察对象,了解本时期文学思想的标准特征,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比如汉代辞赋盛行,为汉一代文学之代表,汉武帝读《大人赋》的心态是“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间意”;司马相如以为“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扬雄晚年却感叹“赋乃童子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班固则认为赋的写作有“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功能。汉赋之盛衰,从汉人的接受心态中不难得见。这种断代读者接受史应是整个文学史写作的基础。还可以有一种写法,即以某种文体为主,探讨此一文体在历代的接受情况;或以某一文体的某一类别,写成分体文学接受史、分体断代文学接受史,诗文辞赋书奏箴铭碑颂传赞,皆无不可。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或可从词义的“符号”“类型”入手,探究读者接受活动的一些具体环节及文本在接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从接受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属的阶层来看待不同阶层的读者不同的接受态度,以及带有阶层性特征的审美趣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除了通常文本分类有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别而外,读者接受也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性差异,同一文本,不同阶层的读者便有相应不同的接受方式,只是传统的文学史多注意士大夫文人的趣味,而很少关注到一般百姓的接受态度和方式,在各种笔记杂录中却保存不少这方面的材料可供参考,文学史写作若对之加以发掘,或许不无收益。再就是以作者为单位,探讨其作品为各个历史时期读者所接受的情况,既了解这一作家作品的流传经过,也由此分析各个历史